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改革部署,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大措施,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一场深刻的变革

基层如肠胃

中共中央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王厚明

学习要论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指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改革部署,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大措施,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努力形成更加成熟、更加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保障。新时代催生新举措,新任务提出新要求,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对于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都具有重要意义。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首要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实践发展的必然,也是道路和制度发展的必然。因此,要更好地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具体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和全过程。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就是从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强化党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更好发挥党的职能部门作用、统筹推进党政机构、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等方面,对完善坚持和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作出具体部署,从而有利于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有利于从制度上保证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基本导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使党和国家机构设置更加科学、职能更加优化、权责更加明晰、监督监管更加有力、运行更加高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党的领导,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推行依法治国,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有力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治国理政的任务更加艰巨,唯有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才能更好地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要求必须解决机构编制中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如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不再保留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将诸多监管职能综合到一个部门,这样就可以加强相关机构配合联动,避免政出多门、责任不明、推诿扯皮等问题。再如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统筹配置行政处罚职能和执法资源,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这样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多个大盖帽管不住一顶草帽”的怪象便有望打破。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具有系统设计、问题导向、重点突出的鲜明特征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目标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与以往机构改革相比,此次改革方案具有许多新变化和新规定。

改革注重系统设计。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部门先后进行了4次改革,国务院机构先后进行了7次改革。与以往改革更多地分别关注党政系统内部的机关、体制改革不同,这次机构改革是经过系统设计的全面改革,改革对象包括党、人大、政府、政协、司法、群团组织、事业单位、跨界地、中央和地方各层级机构。改革内容除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外,还包括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统筹党政军群机构改革、合理设置地方机构、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和加强党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领导等。这充分体现了本次改革的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机关设置、职能配置的系统性、整体性。

改革突出问题导向。当前,一些领域党政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还不够健全有力,一些领域党政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权责脱节问题比较突出,一些机构设置和职责划分也不够科学,职责缺位和效能不高等问题比较明显。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将会妨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本次机构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正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以敏锐的前瞻性牢牢把握改革的方向,注重解决机构编制中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如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不再保留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将诸多监管职能综合到一个部门,这样就可以加强相关机构配合联动,避免政出多门、责任不明、推诿扯皮等问题。再如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统筹配置行政处罚职能和执法资源,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这样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多个大盖帽管不住一顶草帽”的怪象便有望打破。

改革强调重点突破。本次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的另一特征是注重找准“主攻点”,牵住“牛鼻子”,着重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机构职能优化和调整,提高政府执行力。生态环境保护过去存在职责分散,各管一段的“九龙治水”局面。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整合了分散于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部、农业部和国家海洋局等部门的环境保护职责,从大环境大生态大系统入手,着力解决环境问题,保证持续用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为了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新组建了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不再保留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划转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制定职责到中国人民银行。这样一来,可以有效避免监管漏洞和监管重叠,在制定金融机构的风控标准时,也可以更好地协调统一,有助于建立起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长效机制。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充分彰显了科学性、民主性、法治性

这次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政治任务。而改革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法治性将有助于下一步不折不扣地把改革的要求落到实处。

改革方案体现科学性。科学性就是保证整个机构改革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需要。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更加注重优化党和国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坚持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加强相关机构配合联动——职能调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条机构改革演进规律的清醒认知,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

对于当代世界主流改革趋向“整体政府”理念的吸收。另外这次机构改革新组建了应急管理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等部门符合学界和人民群众一直以来的呼吁,反映了机构改革紧盯世界强国的标杆。

改革落实体现民主性。民主性强调的是在多元社会现实的背景下,普通公民通过自由平等的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从而保护自身利益。因此可从过程和结果两个层面来评价本次机构改革。在过程层面,这次机构改革方案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科学决策的结果,凝聚了各方面智慧。如中共中央于今年2月6日和28日分别举行党外人士座谈会和民主协商会,就《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向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通报情况,听取意见。在结果层面,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如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医疗保障局等部门的组建无不彰显了这一点。

改革推进体现法治性。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必须坚持机构改革和法治相统一、相促进。《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依法管理各类组织机构,加快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一是完善党和国家机构编制管理制度。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研究制定机构编制法,增强“三定”规定严肃性和权威性,全面推行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制度。二是强化机构编制管理刚性约束。强化党对机构编制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统一机构编制有关信息,接受各方监督。严格机构编制管理权限和程序。严格执行机构限额、领导职数、编制种类等规定。三是加大机构编制违纪违法行为查处力度,严肃纪律和追究问责。

(执笔:黄振威)

论苑漫笔

学习党的创新理论,过党组织生活,加强党性培养,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培养不讲假话的习惯,提升辨别假话的能力,从而更加有效地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类的东西

远离谎言 多说真话

——纠正“四风”不止步系列谈之十

■严泽平

没有真话,就难知真相;难知真相,就难做到真实;做不到真实,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事业成功。习总书记反复告诫党员干部,要忠诚老实,努力做到“三严三实”。我们只有时时处处做真人、崇真理,远离谎言、不说假话,才能避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歪风,扎扎实实推进强军事业发展。

但在现实生活中常常遇到讲假话的现象,比如,为了展示工作业绩,有人故意拔高说出“探索了新路子、跨上了新台阶、积累了新经验”之类的话;为了肯定某项活动,有人不顾事实地罗列出“效果非常好、反响非常棒、成果非常多”之类的话;为了赢得上级认可,有人生编硬造出“制订了最佳方案、采取了果断措施、取得了巨大成绩”之类的话;为了迎合上级领导意图,有人随心所欲地讲出“大家意愿极其强烈,处理效果人人满意”之类的话……有成绩讲成绩,是必要的,但故意抬高或无中生有,就是谎言,这既反映一个人品行不端,也反映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不够,对事业更是贻害无穷。

历史殷鉴不远,翻开满纸辛酸的中国近代史,一桩桩鲜活的事实反复诠释着假话的罪恶。

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前,道光皇帝不等地等待着鸦片战争前线的战况。他得到的消息大都是,英夷不堪一击、节节败退,大清军以英勇顽强、所向披靡。这让道光着实兴奋不已,为此,一再吃败仗的“靖逆将军”奕山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倒受到嘉奖,其手下得以升迁的官员也在广州街头“弹冠相庆,共沐天恩”。道光怎知,这种欺瞒正加速了帝国的衰落。

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前,慈禧太后搞不清楚义和团究竟能不能打败洋人,于是派出专门人员进行考察,得到的结果是,义和团乃爱国忠勇之士,个个中华民族精英,人人刀枪不入!据此,慈禧便做出了对八国宣战的决定。这世界怎会有刀枪不入的肉身?结果不言而喻。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说:如果过去不再昭示未来,我们的心灵将会在黑暗中游走。时间可以流逝,历史不容遗忘!讲真话、言真情,自古就是上级的爱戴、领导的精神品质,孔子曾告诫说,“内不欺己,外不欺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中华民族对假话的唾弃、对真话的尊崇是一贯之的。讲真话是一个领导干部自身在身的、正义在手和有公心、有正气的要体现,我们必须具备讲忠诚的品格、谋实事的精神。

套路化、习惯性的谎言,表面上似乎没有刻意欺骗的成分,甚至一时看不出危害。但历史一再证明,习惯性讲假话的危险不仅在子假话本身,更在于它对它的漠视与麻木,这种漠视与麻木必将影响发展大计,乃至

模糊了前进方向。

新时代是一个需要更加奋斗拼搏的时代,而要在奋斗拼搏中收获成功,就必须求真务实。如果说,万丈高楼是建立在牢固的地基之上的,飞速的动车是奔跑在坚固的轨道之上的,那么,强军兴军的伟业,也必须建立在讲真话、办实事、务实效的基础上。学习党的创新理论,过党组织生活,加强党性修养,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培养不讲假话的习惯,提升辨别假话的能力,从而更加有效地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类的东西。

说谎言、讲假话,有人觉得是为了“集体荣誉”,将成绩夸大一点,是为单位好。实则不然,集体荣誉不是骗来的,骗来的荣誉也是官兵不认同的。一个单位好不好最终还是看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效,看备战打仗的能力,在这方面我们不要低估了领导、机关和群众的认知能力。其实,有些人所谓的“为了集体荣誉”,实质不过是为了自身的虚荣和利益,这种扭曲的荣誉观利益观实属党性不纯、品德不纯的表现,必须祛除。

革命先辈早就告诉我们,共产党人要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因为唯实才能脚踏实地,才有事业的勃勃生机。(作者单位:云南省军区玉溪军分区)

品读经典

国家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

■马立党

长期以来,许多人对国家“是什么”“有何作用”“走向何处”等问题并没有搞清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着巨大贡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就是科学解答国家历史之谜、解决国家领域问题、指导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金钥匙。

恩格斯晚年对国家这一事物进行了深入研究,于1884年写下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这篇经典著作。恩格斯之所以研究这个问题,一是完成马克思生前没有完成的工作,了结战友的遗愿;二是弥补唯物史观在人类史前史问题上的“短板”,构建起完整严谨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三是消除当时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有针对性地指导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19世纪80年代,“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推进德国资本主义发展上采取了国有化改革诸措施,对工人阶级运动造成了分裂性的影响。部分工人认为可以通过“国家”的帮助来实现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充满幻想。上述种种原因,使得恩格斯只能通过考古学对古代史的研究,来揭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本质。

在《起源》一文中,恩格斯在马克思所作的《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基础上,以实证研究的方法,明白晓畅的文字论述了给人以“惊喜”“知识”“智慧”的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认为国家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社

会相异化的力量;国家的存在离不开公共权力和捐税财力的支持;国家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亡。

一个人只能提出所处的那个时代需要解答、所能解答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恩格斯科学回答了国家起源、本质、消亡的问题。19世纪80年代末,历史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帝国主义时代。20世纪初,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了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进程,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显著发展。与此同时“在几十年较为和平的发展中积聚起来的机会主义成分,造成了在世界各个正式的社会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流派”,社会沙文主义者坚持宣扬错误的国家观,对帝国主义非正义战争采取了“卑躬屈膝的迎合态度”。鉴于此,列宁提出“如果不同‘国家’问题上流的机会主义偏见作斗争,使得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就无法进行”。他指出,“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空前流行的时候”,首要的任务是“要考察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回答“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国家问题。

列宁在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基础上作了新的发展,他从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阐发了国家的必要性、重要性,并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形式、意义及其发展趋势。提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又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从资本

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镇压是必要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应当是“新型民主”和“新型专政”的统一;无产阶级“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正是在与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战斗中向前发展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本质、消亡诸观点的科学性、真实性;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正确性、深刻性。

当今世界处于多种制度并存的态势和格局,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博弈竞争日趋激烈。无论何种制度,国家依然是国际体系中最重要、最活跃、最顽强的因素,国家兴衰存亡、国家竞争、固本者稳、变革者强、创新者胜。当前,强化国家意识仍然是不同国度人民利益实现的手段,我们必须顺应世界发展大势,敢于竞争、积极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的,遵循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搞好国家政权建设,就必须始终站稳人民群众的正确立场,建设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断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克服官僚主义弊端,加强和改进国家内部和外部职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保证。